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 传教士汉学研究

[中] 张西平 著

THE STUDY OF  
MISSIONARY SINOLOGY



大象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 传教士汉学研究

[中] 张西平 著

THE STUDY OF  
MISSIONARY SINOLOGY



大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教士汉学研究/张西平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5  
ISBN 7-5347-3807-5

I. 传... II. 张... III. 传教士—汉学—研究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642 号

## 传教士汉学研究/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 著 者 张西平  
责任编辑 魏淑民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欧阳林棣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94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24.4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前言

中国学术界将国外汉学(中国学)<sup>①</sup>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作为研究的对象,有两种做法:一是取其知识论上的成果,促进本土学术的发展。例如,史学界在敦煌研究上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成果的汲取;语言学界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成果的吸收。二是对汉学家研究方法论的学习,以变更本土学术研究的“范式”,如杨堃对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宗教社会学”的吸收,首次将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引入到中国宗教史的研究之中。而这两方面都有赖于对国外汉学的研究,因为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若不了解其学术的流变和发展,则无论是从知识论上还是从方法论上对其汲取和借鉴都会产生问题。

前辈学者早已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和朱滋翠翻译的日本学者石田于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就是国人最早的对西方汉学史进行研究的著作。但如何对西方汉学史分期,两人各有自己的表述。最近出版的由何寅和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是近年来国内第一本关于海外汉学的通史性著作,该

---

① 以下在谈到整个西方汉学时,我所使用的是广义的“汉学”概念,它包含“中国学”这样的历史形态。

书将东西方汉学历史融为一体,分为“国外汉学的滥觞和酝酿(从古代至18世纪)”、“国外汉学的确立和发展(19世纪到20世纪)”和“从传统‘汉学’到现代‘中国学’”三个阶段。

从西方汉学的历史来看,我主张采用“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的分期倒更为合适。理由在于:其一,这样的分期基本符合西方汉学发展的实际历史。《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游记汉学时期的主要代表著作;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杜赫德所编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等书是传教士汉学时期的主要代表;1814年12月11日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开始设立汉学教授的位置,雷慕沙的《汉文启蒙》成为专业汉学的代表性著作。这些判断和结论是得到几乎所有汉学家认可的。西方汉学的历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其二,这样的分期突出了传教士汉学的特殊地位。

以上的分期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它们也不是决然分开的,专业汉学在1814年诞生以后,传教士汉学依然很发达,马伯乐说18世纪是传教士汉学的世纪,其实19世纪同样也是传教士汉学的世纪,虽然在欧洲专业汉学得到了稳定的发展,但在中国仍是传教士汉学家们的天下,只要提及马伯乐的乡顾赛芬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足够了。虽然,这三种汉学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大体来说,还是有个分期,这样划分不仅是在时间段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学术特点上的区分。

传教士汉学的学术特点是很明显的。也许有人认为传教士汉学的价值不大,因为它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在传教学之中的,许多研究没有建立在现代学术的基础之上。这种看法诚然有其合理性,但其实西方汉学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受其不同理论框架的影响,按萨义德的看法,现在西方的整个东方学都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下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出发点都是有问题的。当我们把西方汉学作为其研究对象时,并不会因其不同的理论框架而放弃研究。从比较文化和跨文化研究来看这是正常的,我们要做的是了解西方汉学在西

方学术和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学术是如何发展的,它的发展对西方和中国的学术有什么价值和启示。

如果有了这样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传教士汉学的独特性。

首先,我们从西方学术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传教士汉学实际上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这一点莫东寅看得很清楚,他说:“从来欧洲人关于东方的知识,多得于旅行之见闻,或事业之报告,至十六世纪,东印度航路发现,耶稣会士东来,于东方文物,始进入于研究之域。十八世纪,礼仪问题发生,遂提高欧洲本土之极东探索,各教士皆为拥护本派,详细研究中国礼俗,其报告论战,甚刺激欧洲宗教界,东方研究因而愈广。东来教士及欧洲本土学者相偕并进,至十九世纪,汉学于焉确立。”在欧洲的东方知识演进的过程中,入华的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是为至为关键的。

无论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还是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内涵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深入的研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可观。利玛窦等入华的耶稣会士中不少人一生用中文写了十几部、二十几部著作,虽然他们有中国文人的帮忙,但即便如此,这个成就也是很值得夸耀的。宋君荣的《中国天文学史》、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就是在今人看来也是很有价值的。雷慕沙认为,利玛窦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此说绝不为过。因为,西方专业汉学的诞生和起步,实际上是直接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开始的。雷慕沙走马上任后,如果没有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他就开不了课,他自己的成名作《汉文启蒙》就是受启于马若瑟的《汉语札记》。理雅格翻译的《中国经典》,卫礼贤翻译的《易经》,时至今日也仍是欧美汉学家们案头必备之书。传教士生活在中国,他们与中国实际生活的那种紧密联系是许多后来的专业汉学家所不能及的。

传教士汉学的独特性还在于,作为一种对东方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它与西方思想的变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在18世纪。只要提

一下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茨和入华传教士的交往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无论是“游记汉学”还是“专业汉学”，都从未像传教士汉学那样深刻地影响欧洲思想史的发展。因此，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必须是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个是他们生活的中国；一个是他们所影响的欧洲。任何一个学者，一旦进入传教士汉学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自己站在中西文化的交会处，这和那些后来大多数从未来过中国，仅仅依靠文献来做研究的专业汉学家有着明显的不同。

传教士汉学对中国的学术和思想来说，其影响力也大大超过了“游记汉学”。从晚明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入华到晚清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等人入华传教士的活动，可以说从晚明到整个清代中国思想和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外因就是。胡适则认为“17世纪耶稣会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就是文化间一见钟情的好例子”。胡适说得不错，徐光启第一次见到圣母的西洋油画时，久久凝视而不愿离去；晚明大儒冯应京读到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时，爱不释手，马上翻刻；李卓吾曾几次和利玛窦见面，帮其修改奏书，赠其诗文，称他为“极标致之人”。三棱镜的神奇、红衣大炮的威力、《几何原本》的实用、天文观测的准确，这些正如胡适所说“科学上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为它赢得了不少当时最富才华、思想严谨的学者”。晚清时基督教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中国丛报》对魏源等进步思想家的影响，基督新教所开办的教会大学、医院等对整个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作用，这些都被学术界所认可。

在学术上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也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不少研究成果至今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例如，入华传教士的汉语研究和成果，长期以来学术界重视不够，除了罗常培先生等极少的学者外，中国语言学史的学者很少将其纳入研究的视野。实际上中国语言的变化大都是在同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发生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古汉语的影响。目前，研究佛教对中古汉语变迁的影响的论文、著作很多，但对基督教传入后对中国近



代语言变迁的影响研究不够。实际上入华传教士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对汉语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很大的。最近,语言学家游汝杰先生在谈到传教士的中国方言研究时,认为传教士在音韵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乾嘉学派的语言学家们高得多。这样的结论恐怕会使很多人吃惊!中国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是1898年由马建忠所写,而实际上早在1703年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就用拉丁文在广州刊刻了《华语官话艺术》。仅此,便可说明我们要重新认识传教士汉学研究的成果及其价值。

“十九世纪欧洲传教士观察中国农村所留下的记录,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极佳的第一手资料。1950年代初期肖公权院士撰写《中国乡村》(*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19th Century*)巨著时,就参考了大量的欧洲传教士的著作。”费正清也认为,揭开中国近代以来发展原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入华传教士的研究。

即便是今天的专业汉学,对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变迁的影响也不及传教士汉学。今天学术和思想虽也处在重建时期,并也和西方专业汉学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但大体上自己的脉络是清晰的。而相比之下,从晚明到晚清,则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和学术范式急剧转变的时期,外来思潮对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催生出中国的现代思想和现代学术。其间,传教士们的汉学研究,他们所介绍的西方思想发挥过重要作用,当时他们的影响力绝不是今日的专业汉学所能及的。

这些都说明传教士汉学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无论是研究西方汉学的发展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基督教史、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都绕不过这个环节。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对传教士的研究,无论是对明清之际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研究,还是对晚清时入华的基督教新教的研究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如何将中国基督教史

的研究和传教士汉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不少人仍将其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直接影响到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因为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需要一定的外语阅读能力,除了语言能力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国外一些汉学家所提出的所谓“汉学的转向”这一学术模式的影响。这种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方法从“传教学研究”到“汉学研究”的转向是由国外汉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对早期耶稣会的一般的研究多是‘传教学’的研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著名耶稣会士的生平和活动,集中于耶稣会传教策略和‘礼仪之争’这一多有争议的问题,集中于西方的原始资料,在某种程度上也集中于耶稣会自己的中文著作”。<sup>①</sup>他们认为后来西方汉学界对明清基督教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一转变即是:人们从重视对传教学的研究转向重视对中国文人对西学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研究(后者包括科学技术和数学)。”<sup>②</sup>

这本是西方汉学界的一种观点,但一些中国学者也跟着如是说,似乎中国学术界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确有这样一个转变。这真是一个大误解。其实,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变是西方汉学家从自己的传统来讲的,它和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并无关系。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创者陈垣先生一开始就注意所谓的“汉学问题”,即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问题。但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人不明白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之别,直接把这种“汉学转向”的研究模式移植到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中。这种方式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方面。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研究,也很重要。但这种研究方向对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来说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也谈不上什么学术上的“转向”,因为,陈垣先生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

<sup>①②</sup> 许理和:《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研究》,《国际汉学》第4辑,第443、445页,大象出版社,1999年。

如果有什么“转向”，那只是对西方汉学自己而言。如果将这种转向作为一种学术的范式接受下来，就会在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会忽略传教士的活动。这显然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不利，因为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史来看，其主导方面是传教士，如果这个主导的方面抓不住，明清基督教史的主线就会模糊。这点我会在其他文章中详细展开，这里姑且不做深入论述。

第二，这种理解把入华传教士统一的整体两个方面完全分开了，即把“传教士汉学”和“传教士在华活动影响”这两个方面完全分开了，或者说将传教士的西方语言著作及其影响和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及其影响分开了，从而使许多人忽视了传教士汉学的研究。

应该承认我们偏离陈垣、方豪先生所开辟的学术研究很久了，在我们刚刚回到这个学术传统时，对传教士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来看，对传教士西方语言著作了解的欠缺恰恰是我们学术上的不足。这里我只是想指出：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来看，我们必须加强传教士汉学的研究。

要推进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有两点特别重要。其一，应从原始著作和文献出发，在第一手材料上下工夫。傅斯年先生曾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和前人所创造之体系，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的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则退步。”如果将传教士汉学史作为研究对象也同样如此。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停留在国外研究的二手材料上，而应直接面对原文。这方面值得称道的是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这本书是直接 from 第一手材料出发，从个案研究入手，特别可贵的是他直接将国外研究者的成果纳入讨论之中，对其不足进行批评。这同那种完全依赖国外二手材料，只是将别人的研究转述成中文的做法根本

不同。目前关于入华传教士汉学方面的研究论著虽然渐丰,但真正从一手原始文献出发的研究仍不多见。

其二,如何将传教士汉学的著作和明清史的研究与欧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把传教士的著作放入中西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加以研究,这是传教士汉学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所在。

收入这本论文集的文章是我近年来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成果,在基本思路上是按上面所讲做的。可以说我自己只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了,但做得并不理想。由于文章写作时间不一,有些论文今天看起来并不很成熟,但我还是收了进去。写作是学者的生命,我珍视生命的每个阶段。

我很有幸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思想巨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学术重建的大时代。当我们接过前辈的学术话题时,仍感到一切那么崭新,在那炮火连天的动荡年代,他们早感觉到了许多重大的方向要去研究,但时代没给予他们时间。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法国汉学家考狄的《欧洲汉学史书目》,可惜讲者有心,听者无意,最后这门课竟越听人越少。陈垣先生在给马相伯的信中就希望能继承明儒李之藻未竟之伟业,编出一套《天学总函》,像编《开元释教录》那样,编出一本《中国基督教史总目》。南北二陈,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拓荒者,都注意到了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国学术研究中入华传教士汉学这个重大的学术方向,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但路不过刚刚开始,一切还有待我们的继续努力。中国学术的重建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需要一砖一瓦的积累,我希望通过这个论文集,也能对我国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尽一己绵薄之力,为这条前辈所开辟的学术之路加上小小的一块铺路石。

张西平

2004年7月30日于北京枣林路游心书屋

## 目 录

前言 ..... (001)

## 传教士人物与著作研究

-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 (003)
- 利玛窦和他的著作 ..... (029)
- 附录 《二十五言》前言 ..... (036)
- 《交友论》前言 ..... (037)
- 《天主实义》前言 ..... (042)
- 《天主教要》考 ..... (047)
- 利玛窦的《天主教教义》初探 ..... (059)
- 《穷理学》——南怀仁最重要的著作 ..... (080)
- 附录 进呈《穷理学》书奏 ..... (088)
- 《易经》研究：康熙和白晋的一次文化对话 ..... (091)
- 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读《易经》文献初探 ..... (111)
- 《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 ..... (126)
- 儒学在欧洲的早期传播初探 ..... (135)
- 论明清间入华传教士对理学的解释 ..... (146)
- 明清间西方灵魂论的输入及其意义 ..... (160)

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中文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172)

## 传教士汉语研究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 ..... (201)

一 应加强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 ..... (201)

二 西方人近代以来的中国语言观 ..... (226)

三 西方近代以来汉语研究的成就 ..... (247)

四 明清时期汉语教学概况 ..... (274)

## 传教士汉学译著评述

遥望中国 ..... (295)

——简介基歇尔的《中国图说》

从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说起 ..... (311)

中西初识 惊鸿一瞥 ..... (316)

——写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出版之际

法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力作 ..... (320)

——读阎宗临先生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有感

传教士汉学的重要著作 ..... (323)

——关于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

清代江南天主教史的一幅真实画卷 ..... (330)

——读《清初传教士鲁日满常熟账本研究》有感

展现清代生活的画卷 ..... (336)

——写在《中国新史》出版之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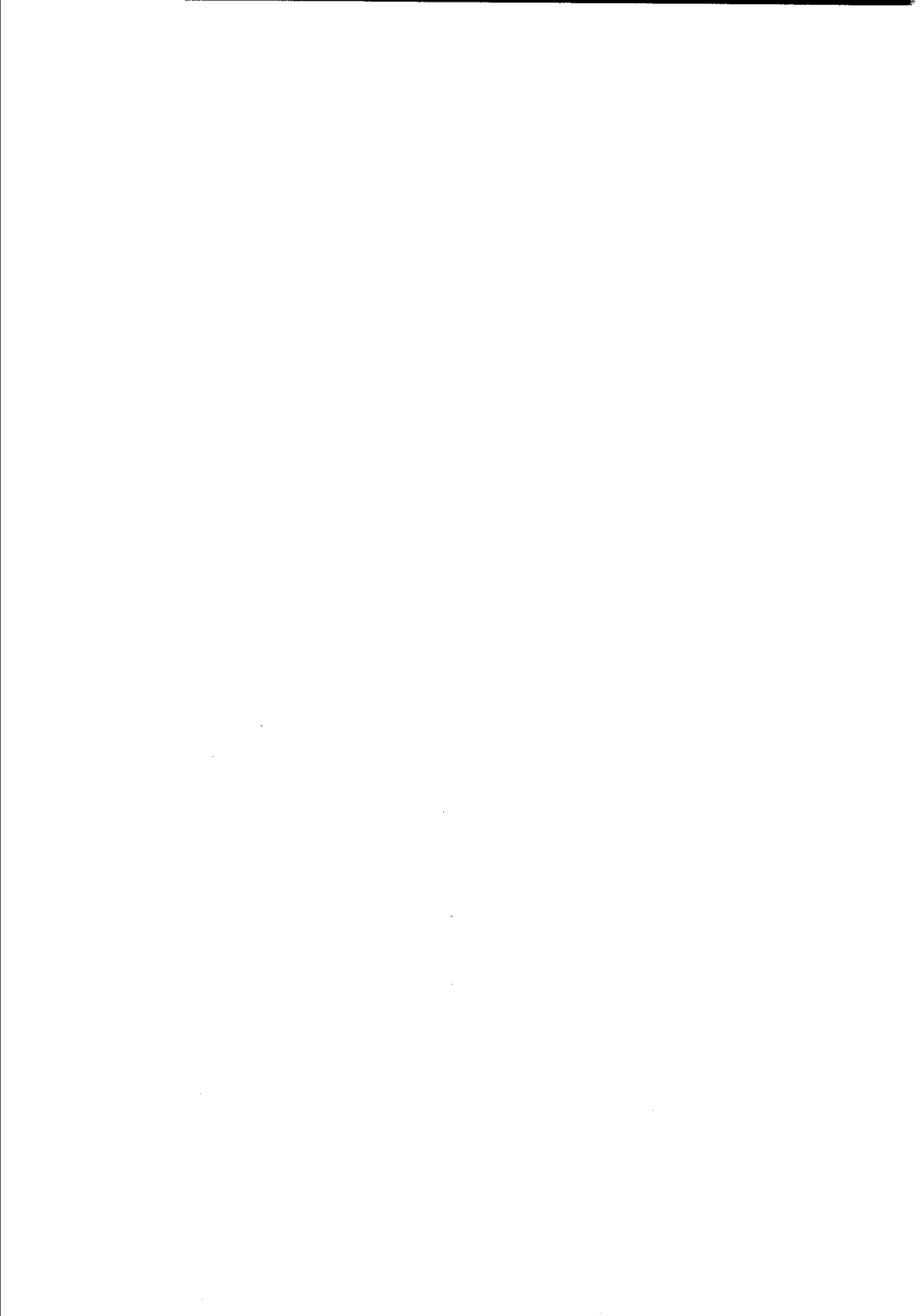
西方早期汉学的“千古不朽之作” ..... (341)

——读《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跋 ..... (346)

后记 ..... (348)

# 传教士人物与著作研究





##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sup>①</sup>

汉学(Sinology)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得以确立并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从而对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同时产生广泛影响,其间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学术演变和发展的一个侧影。

在我看来,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创立,应该是在“传教士汉学时期”。

“游记汉学时期”早可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甚至以上推到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4),此间有亚美尼亚的乞刺可思·刚扎克赛(Kirakos Ganjakeci)的《海屯行记》、意大利人约翰·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的《柏朗嘉宾行记》,到大航海以后还有葡萄牙人托雷·皮莱资(Tome Pires,1465—?)的《东方志》、柏来拉(Gali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这时期的最高学术成就当属西班牙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dozo,1545—1618)的《中华大帝国

<sup>①</sup> 本文曾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